

【抗日战争研究】

# 从“反日”到“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日口号的变化(下)

桑 兵

**【摘 要】**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中共的对日口号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主导的趋向,就是从“反日”转向“抗日”。“抗日”与“反日”两种口号,均出现于1928年济南事变触发的反日风潮中。日本占领东北,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中共针锋相对,以“反日”为号召,并与反蒋联动。经过承认东北、华北及上海民众士兵的“抗日”,到逐渐对党外使用“抗日”的名义,进而打出“抗日”的旗帜,两种口号内外有别,长期混用,分际日见淡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调整以及中共领导权的易位,中共中央针对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危局,顺应輿情民意,从坚决反日反蒋的国际阶级路线逐渐调整到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合作抗日的民族战争的轨道上来,使得全面抗战来临之际全体中国人集合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关键词】**抗战时期;反日;抗日;中共中央;国民党

**【作者简介】**桑兵,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文科资深教授(浙江 杭州 310058)。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23.3.109~122

## 五、“反日”与“抗日”并用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华北危机陡然加剧。中共中央指出其目的在于占领整个华北,与满洲一起变成进攻苏联的根据地,极端增长了列强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危险。作为应对,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与扩大苏区,红军反攻国民党,以加强反帝运动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要组织和吸引群众参加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民族解放战争,大批动员工人及群众组织反日义勇军或参加东北热河义勇军,工农学生武装起来,开展反日游击战。<sup>①</sup>同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告全国民众书,警示日本不仅企图把热河变为伪满洲国的一部分,而且下一步就是占领平津和黄河以北大部分土地,对中国实行殖民统治,使之变成反苏战争的根据地。中国要实现社会和民族的解放,必须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地大人众的中国成为列强的分赃品,是因为国民党镇压民众,出卖中国。只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实行民众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战胜帝国主义。<sup>②</sup>

面对华北危局和亡国危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月17日发表宣言,表示愿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反对日本侵略,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创立义勇军,保卫中国及争取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谴责国民党军阀“对于抗日士兵的压迫遣散与屠杀”。<sup>③</sup>4月15日,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宣言,重申愿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指出“西南政府与福建的军阀一样是不反对日本及其他任何帝国主义的,最近他们的‘北上抗日’的宣传完全是欺骗民众的鬼话,实际上,是为着扩张自己的地盘和进攻苏区与红军”。国民党则以“剿共即抗日”,“在共未肃清前,不许言抗日”来阻止士兵群众的革命化。<sup>④</sup>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宣言的实际撰写和发表人是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在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架构下,当时中共的组织系统具有一些与全面

抗战开始后不同的特色,如因为中央很难统一实时掌控各地的实情并实施领导,设立了若干分局或中央局,它们同时直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有时甚至可以向全党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这种特殊关系使得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可以自行代表中共中央对全党乃至国内国际发布重大宣言和决策。长征后解决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权宜办法之一就是成立西南局,直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以免与中央冲突。而长期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职务的王明回国后仍然自以为中心,试图与中央分庭抗礼,也是渊源有自。

把握相关语境,对于理解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再度以中央名义致信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就比较容易。这封信在中共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中至关重要,它承认并批评中共在东北的影响和组织十分薄弱,游击运动更多带着群众性质。满洲游击队总共约30万人,主要分为旧吉林军队组织、王德林等的反日义勇军、农民游击队和赤色游击队。后者力量太小,还不是整个运动的领导者和主导力量。第一部分的领导人为张学良部下将领,如马占山、李杜、丁超、苏炳文、朱霁青等,服从国民党指挥,依靠地主资产阶级和富农。他们在美国的影响下,由于民众反帝民族革命运动高涨,受士兵和大部分军官反日情绪的威胁,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实行抗日战争,却仇视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解除反日义勇军的武装。他们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在适宜条件下和必要的时候,会叛变投降,而且已经阻碍群众游击运动的发展。其战斗力较低,马、李、苏等部已经失败。

朝野各种反动派表面同情满洲的反日运动,空谈援助,其实是想垄断满洲游击队的物质和精神援助,掩饰民族叛徒的真面目,以肃清后方破坏分子为名,加紧“围剿”苏区红军,并借口国难期间全国一致,压制民众。他们散布对国民党民族革命的幻想,镇压群众的反日运动,夺取反日运动的领导权,使之限制在单纯军事行动的范围。必须争取反日运动的领导权,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满洲问题既是完成民族解放的革命任务,保护苏维埃中国,也是完成国际的任务——武装拥护苏联。我党现阶段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夺取和巩固反日群众斗争的领导。总的策

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而不一定可靠的动摇力量,共同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

要实现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总政治口号,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民族叛徒的财产,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扩大广大群众的游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者,建立选举的民众革命政权,主要靠正确地灵活地实行特殊的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首先是反日统一战线,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其中的领导权。并严格注意、坚持和保存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反对右倾投降与“左”倾关门;分别对待不同对象,如不同的游击队;牢记下层统一战线是基础,上层统一战线只有在下层坚固并影响上层时才可能有用;无产阶级在一定场合和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这部分人还用武装方式与帝国主义斗争时,意味着要用特殊方式与之争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真正革命的统一战线,要有广大的群众革命组织,并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要保持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坚决拥护农民的要求,只有农民加入才能独立组织党的武装力量,实现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sup>⑤</sup>关于民族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关系中共中央也有新的说法,虽然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前提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但中国民众反抗日本进攻不会等到它被推翻。国民党的投降与出卖主权会加剧人们的嫌恶,因此苏维埃和红军愿意与抵抗侵略的民众、士兵、军队和义勇军合作,缔结作战协定。<sup>⑥</sup>

上一年的11月间,上海举行了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议,一致通过下列决议:电请政府恢复中俄邦交;退出瓜分中国的国际联盟;反对共管中国之李顿报告书;保护民众抗日团体,要求政府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行动之自由;将全国军队除于重要都市酌留少数驻军(最多不能超过全国军额的百分之四十)外,其余全数开赴东北以武力收复失地;重新厘定全国军费,划出全额百分之八十为抗日军队之用;将东北义勇军编为正式国防军,予以充分接济;准许全国民众自动武装抗日。会议虽然不是由

中共领导,对于国民党还抱有幻想,但主要决议却代表广大群众的要求。可是除中俄复交外,其余徒具空文。2月10日,中共中央致信各级党部,主张发动全国民众检查这些决议的执行,揭破国民党的清道夫作用,掀起反帝反国民党浪潮。为此,决定召集全国民众团体第二次救国会议,用全党力量组织广大群众的反帝运动,争取和团结他们到党的领导下。会议的中心口号是争取中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立即派遣全国军队的百分之八十去收复满洲与山海关并防卫热河及华北。会议应与反帝非战大同盟预计当年在中国举行的反战大会联系起来。由于党在反帝运动中的工作比较薄弱,使国民党的安内攘外等宣传欺骗民众,要最大限度争取公开活动,防止关门主义,广泛利用一切公开和半公开的组织和个人(如一切反帝群众组织、义勇军、左翼作家、工会、学生会等)发起会议。中央责成江苏党立即在上海成立筹备总会,动员所有党团工会在工厂、学校、兵营、机关及一切群众团体成立筹备分会,民选代表。决议还要求兵工厂提出“武装工人抗日”等口号,意味着“抗日”可以作为自己行动的标志。<sup>⑤</sup>

在接过抗日旗号的同时,反击污名化中共反对和破坏“抗日”的宣传工作也得到加强。3月,中央宣传部制定反对叛徒斗争的提纲,特别指出叛徒的行为之一,就是污蔑苏维埃和红军“扰乱抗日后方”,“‘障碍’抗日战争”,借口“抗日必先剿共”消灭苏维埃,污蔑“中国共产党破坏统一的民族战线”。此外,对于国民党不仅是揭穿其假抗日,更重要的是谴责其非但不派兵北上抗日,反而要清除抗日战争,摧残共产党与抗日群众。<sup>⑥</sup>也就是说,国共之间由抗日与反日的针锋相对,朝着争夺真抗日的方向转变。肯定民众的真抗日,正是为了揭露与否定国民党的假抗日。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共仍然主张“反日”,不过已将民众的“抗日”视为同道。在中共中央3月25日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中,“东北义勇军士兵和群众之武装抗日战争”,成为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的重要体现。红五月反帝工作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在广大群众的下层统一战线基础上开展民众团体救国会议的运动,会议至迟应于当年五七在上海开幕。党要积

极准备在满洲、热河开展反日游击战,在河北则组织“民众抗日保卫平津协会”和民众义勇军,“要求将整个华北军队开赴前线抗日”。抗日的义勇军被蒋介石调到后方解除武装,河北党应与之联系,将其组织起来。兵工厂和铁路工人应“反对派兵南下,主张出师北上抗日”。红五月口号的第9条,就是“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国民党解除抗日士兵的武装”。<sup>⑦</sup>“抗日”与“反日”越来越相得益彰。

5月25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严正指出:日本的要求之一是镇压一切抗日运动,华军撤出平津,退到黄河南岸,承认满洲国,军事上财政上帮助国民党进攻红军和苏区。一切的抗日运动,都受到国民党的摧残镇压,甚至谈一句抗日的話,都要受到“最严厉的处分(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一贯投降与镇压抗日战争,镇压一切民众的抗日斗争。要结成工人农民兵士贫民学生和青年的统一战线,开展群众反日反帝斗争。<sup>⑧</sup>同日,中央紧急通知各级党部,反对中日秘密谈判与国民党出卖平津及华北,指出南京政府一贯投降,破坏和镇压民众的反帝斗争及抗日的义勇军的战斗。要在工厂、学校、兵营、农村组织“反对卖国谈判与保卫华北委员会”,在“武装保卫平津”的口号下,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sup>⑨</sup>

上述变化显示,鉴于东北和华北众多义勇军坚持抗日,以及全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中共不再将“反日”和“抗日”对立起来,而是同时并用。只是仍然有所区别,对党内以及提出自己的主张时,主要还是用“反日”,对党外以及指其他民众的对日斗争时,则依照实情多用“抗日”。如6月23日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肯定“在满洲及华北义(勇)军的活动与群众的抗日斗争是向前发展的”。<sup>⑩</sup>8月5日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五次“围剿”告全国民众书,呼吁“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开展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战争”。<sup>⑪</sup>10日关于九一八两周年纪念的决定,则提出必须“组织群众的反日运动,进行一切反日的组织与斗争”,“必须加紧领导反日的民族革命的战争”,“河北党必须以战斗的动员革命的工人农民与反日的战士去加强扩大前线的抗日运动”。<sup>⑫</sup>

承认和肯定民众的“抗日”,不仅有利于最大限

度争取对日力量,而且使得揭露与抨击国民党的虚假抗日更为有效。如此一来,实行广大的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中共中央认识到:“我们党不应该抹杀这一事实,就是我们党的政治口号,还没有为大多数群众所了解与积极拥护。有的还在国民党各种民族武断宣传的影响之下依然幻想着它的‘新的生命’,有的还是为黄色工会工贼们所欺骗着,有的是在国家主义派及其他一切反动派别蒙蔽和麻醉之下。这只有在我们党坚决实行广大统一战线的基础之上开展反对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别的斗争,才能把这些群众从这些反动的领导和它们的政治影响之下解放出来。”没能在反帝斗争中建立统一战线,“正是我们的弱点”,“天津没有一个在我们领导之下的反日的工人群众组织和工人义勇军”,上海的情形也类似。要参加各种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尤其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大规模群众斗争,学会对千百万群众说话,把党的口号变成广大群众的口号,而不是一味重复先锋队的口号。而广大群众的公开运动最重要的口号,正是“抗日”。所以要号召民众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组织工人学生的抗日义勇军;华北的抗日义勇军现在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应组织接济;没收大量用于内战的物品以为抗日之用。<sup>⑮</sup>

中共中央发文专门阐述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实际上是根据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的相关指示作出的。<sup>⑯</sup>恰好国际反帝非战大同盟代表团计划来华,准备9月初在上海召开世界反帝大会,而原定于5月召开的全国民众团体救国代表会因故未能举行,不过有几处开过地方性代表会。中共中央认为可以借此机会推进反帝统一战线,决定与世界反帝大会合并举行,要求全国各地各级党部利用各种形式大力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sup>⑰</sup>由于各地筹备世界反帝非战大会的工作进展不力,8月中旬西欧的代表到沪、会期临近时中央又发出紧急通知,责成“满洲、河北特别准备报告关于满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状况及华北劳苦群众与义勇军抗日的情形”。<sup>⑱</sup>

淞沪抗战两周年来临之际,中共中央计划开展纪念运动,认为苏维埃政府关于抗日作战协定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而“一二八抗日战争中所谓‘民族英雄’十九路军长官及其同盟者与附和者,因

鉴于国民党旗帜之腐臭,法西斯主义之腥秽,福建民众与十九路军士兵在苏维埃直接影响之下而日益革命化,坚决要求抗日反蒋和拒绝进攻红军苏区,同时福建军阀遭受了红军绝大的打击,福建苏维埃领土的扩大——他们不能不抛弃国民党旗帜,成立所谓‘人民政府’,采取一些‘左的’民族改良主义的办法,而与卖国罪魁蒋介石作斗争,来控制民众与士兵,阻止他们走上苏维埃道路,来挽救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福建的事变表示了国民党的新的瓦解,反动统治内部新分裂,革命力量的生长。所以这些都给我们以有利的条件,来开展革命斗争。但是,这种民族改良主义的运用,在一部分落后群众中可以发生一种幻想,这又是对群众走上苏维埃道路上的一个大障碍,而要求我们用最大力量去揭破他们”。面对日本新进攻,“组织与领导反日反帝战争的工作异常迫切。满洲和华北的党,必须用一切力量加强对人民革命军,游击队,义勇军与士兵的领导,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动员他们与劳苦群众进行抗日反满的战争,坚决抵抗日本对察哈尔的进攻及对苏联的挑衅。应把这个工作看作是日前党最中心的工作”。争取将自己组织的反日反帝反蒋运动与各地民众的抗日反满、抗日反帝或抗日反蒋行动及组织,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sup>⑲</sup>

这时中共的正式文件中“反日”与“抗日”的分际进一步模糊化,尤其是涉及党外群众运动的文件混用的情形日益增多。如纪念“一·二八”两周年运动的决议再次确认去年初提出的“抗日作战协定”三条件,号召群众拥护苏维埃红军的抗日作战协定。实则三条件发表时并未使用“抗日”一词来涵盖。而1934年1月18日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则称三条件为“反日作战协定”。<sup>⑳</sup>2月1日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斥责国民党“对于群众抗日与一切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实行最残酷的白色恐怖,“解散中国各地群众的御侮自救会与领土保障同盟等抗日组织,逮捕与屠杀一切抗日的革命领袖与群众”,与日满军队联合“‘围剿’抗日的东北义勇军”,而“苏维埃政府对于全中国民众的抗日反帝运动,给了有力的实际的援助”,号召“全中国的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开展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sup>㉑</sup>

不过,一旦回到党内仍以“反日”为主,只有在涉及党外的具体组织名称时才保留“抗日”。2月22日中央指示满洲省委,信中基本使用“反日”,如“一年来满洲反日民族革命斗争的发展”,“满洲反日游击队”,“满洲反日民族革命战争”,“群众的反日运动”,“与反日义勇军联合”,“号召一切反日武装部队联合起来去反对共同的仇敌”。而谈到磐石的情况时则说“‘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是上层统一作战的机关”,不能以上层勾结代替下层统一战线。这封信着重指出实行统一战线方面有许多严重弱点,主要是浓厚的关门主义倾向,反日纲领常常写上拥护苏维埃红军与联合苏联、拥护中国共产党等口号,使得大部分群众不能接受。首先要参加一切群众的反日运动,团结一切反日民众,建立极广泛的群众的反日统一战线,保障无产阶级领导权。反日会是团结反日人民的最好的方式,组织名称应由人民自己选择。河南党组织在反帝运动中同样存在关门主义倾向,对国民党领导的反日运动态度清高,说“抗日会都成了国民党控制群众的机关”,不计划打入其中工作。三十师士兵自动提出“不打红军北上抗日”,应利用此口号不断鼓动与组织士兵的哗变。<sup>②</sup>此外所提及的为数甚多的组织和活动都称为“反日”。

而在面向社会大众时,“抗日”又成为主调。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告民众书,痛斥“所谓‘无力抗日’,完全是帝国主义奴才的胡说”!包括“一·二八”上海战争,满洲、华北的抗日战争在内,屡次战胜了军事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满洲的义勇军,游击队和劳苦群众们!你们在长期的英勇抗日反满斗争中锻炼了和长大了你们的队伍。……华北的士兵和劳苦民众们!在长城一带的抗日战争中,你们作了最英勇的抗日战斗,给了日本的进攻最大的打击。继续你们过去光荣的抗日精神,坚决反对日本的新进攻”。号召“组织学生反日会和义勇军,自动武装起来,北上抗日收复失地”,号召全国的白军士兵反对不让抗日的卖国长官,“拥护红军对日宣战通电和抗日作战协定……进行抗日反帝战争”,并高呼“一切抗日义勇军万岁”。<sup>③</sup>4月12日中央紧急通知河北党“号召士兵不要听从反动长官的命令,立刻与工农劳苦群众及一切抗日义勇军联合起来,发展游击战

争”。在战区组织民众参加游击战,成立抗日义勇军。满洲党“必须特别加紧对于人民革命军及一切抗日义勇军的领导……建立新的抗日义勇军与游击队”。<sup>④</sup>“抗日”不再仅仅是他人的行动,同时也是自我的主张。

## 六、从内外有别到相互趋同

193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日反帝运动和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的秘密指示信,在从“反日”转向“抗日”的进程中至关重要。既然所谓“抗日救国”是中国民众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取得民众的拥护,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而国共斗争近3年,仍然未能分出胜负,共产党尚未完全取得民众的信任,那么共产党必须证明自己能够完成“抗日救国”大任,以取信于民。“假若我们的党更加紧工作,我们完全有可能把一切誓死不愿当亡国奴,誓死为抗日救国而奋斗的那些忠实的‘民族武装自卫者’(或者所谓‘爱国志士’)夺取到我们方面来”。国民党始终自诩能够担负“抗日救国”的责任,尽管“极大多数的群众已经认识国民党不愿抗日的真面目,但是对于到底怎样进行武装抗日战争?进行抗日战争有否胜利可能?尤其是用什么具体办法解决抗日战争各种最具体的问题(如兵力,武器,军需,领导机关,民众武装等等),还急待了解”。这时党的策略应该更进一步,除继续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外,“首先必须给广大民众一个共同的非常具体的,非常简单明了的对日作战行动纲领”,使民众找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出路。

此外,既然民众最为关心的是“抗日救国”,而国民党又始终以“抗日救国”自居,采用“抗日救国”的说法,不仅有利于争取群众,而且有助于和国民党斗争。况且能否担此大任,既有愿不愿的主观意向,更有能不能的实际能力。国民党的不愿担当大任,并不能反证共产党的足以担当大任。而解决能不能的关键,就是统一战线。可惜党内全体同志没有完全了解去年中央关于统一战线指示的重要政治意义、策略作用和具体运用方法,没有拿到群众中去应用。因此,中央根据去年的指示信和最近的宣言所提出的纲领,拟成《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目的是给全国民众一个明显的具体的容易懂的对日

作战行动纲领,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力量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尽力取得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可能,以便在实际的群众斗争中揭穿国民党卖国的真相,事实上将反日与反国民党的斗争联系起来。面向全社会的“抗日”,在党内还是回归“反日”。

秘密指示信发出的时间,恰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陷入空前困境之际,严酷的政治环境迫切需要广泛灵活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使非苏区反日反帝反国民党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进而使第五次“围剿”受到极大打击,达到更快的崩溃,因此采取了一切可能的甚至超常规的办法,来传播和发表这一纲领,如“由一切所谓名流学者,新闻记者及其他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自由职业者等等(人越多越好,不要尽是色彩浓的,要尽可能的找到灰色的甚至平时是反动的只要他同意这个纲领的——共同签名发表),作为这纲领及委员会的发起人和赞成人”。然后各级党部再将纲领印出,找人签名;在当地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分会,名单汇总到中央,以便近期在上海正式发表;尽一切可能在一切公开半公开的秘密的报刊发表,党报及党领导的报刊要在其后再发表;要领导一切革命组织立刻发表宣言,赞成和拥护纲领,说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自始至终主张人民武装抗日,一切军力用来对日作战,号召全国民众和国民党所有军队立刻接受纲领,停止进攻苏区和军阀战争等一切内战,集中全力共同武装抗日。此外要利用各种形式广泛传播和讨论纲领,发表补充和进一步发挥的文章,反复证明反日战争只要有广大民众参加,前途胜利就有保证,并且要立刻形成组织结果,用组织名义发表宣言传单,表示拥护纲领。用各种组织的名义(从革命组织到各种组织——如律师公会、黄色工会、东北同乡会等)发宣言,通电南京及其他地方政府,要求立刻停止国内战争,动员一切海陆空军北上抗日;立刻发给人民武装;停付日债一切本息,用于救国御侮会作抗日军费;抵制、没收日货。不要怕群众与国民党发生关系,相反要利用各种机会动员一切团体到国民党的政府及商会等机关直接交涉和冲突,使群众认识其卖国真面目。在有国民党党部、政府代表参加的公开大会或代表

会上,直接提出出钱出粮出枪要求,靠群众逼迫其兑现。还要设法传达到士兵尤其是“剿共”前线和后方的部队中,鼓动士兵起来要求北上抗日。<sup>⑤</sup>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由宋庆龄等1779人签名,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发表于1934年9月21日《红色中华》第236期。纲领指出,想依靠国民党及其政府抗日救国完全没有希望,反日的义勇军、救国军、游击队也未能阻止日本进攻,“目前有绝对必要提出几点最根本最具体的办法来,作为我国人民武装(抗日)的共同行动纲领”。包括: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全体人民总动员,组织各行各业的反日义勇军和参战组织。全体人民总武装,发放武器。设法解决抗日军费。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委员会由各界代表各团体在全体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上选出,“有权力解决和支配与中国人民武装抗日有关系的一切事件”。联合日本的一切敌人,向世界宣言,“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作战表同情援助或守善意的中立的国家和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朋友。纲领仍称组织反日战争、反日会和反日义勇军,高呼“中华民族反日神圣战争万岁”!同时自称“武装抗日纲领”。<sup>⑥</sup>“抗日”与“反日”差异虽然存在渊源的印记,但已经没有实质性分际。

此后,“反日”与“抗日”内外有别的情形依然延续,如5月5日党团中央告全国劳动群众书声讨国民党南京政府,沿用反日,揭露国民党“抗日”假象的同时,呼吁东北军士兵反抗卖国长官强迫其南下进攻红军,自动进行抗日战争,以及一切武装部队和士兵起来为实现中华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抗日作战协定的提议而斗争。<sup>⑦</sup>6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宣言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拥护中共中央的反帝纲领,呼吁民众直接参加反日战争,组织民众反日义勇军,援助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sup>⑧</sup>与此同时,“抗日”逐渐由他指变成自称。为了打破第五次“围剿”,7月初,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派遣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闽浙挺进,下达的作战训令是渡过闽江后,“七军团即以中国工农红军

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任务之一是“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为加强抗日的行动,应严格对付日本的间谍侦探,如遇日军小的部队时,则应消灭之,可是不应与日本较大的陆战队及军舰作战”。由中央代表领导党的工作、反日运动和游击战争。另一项任务则是开辟新的苏维埃根据地。<sup>②</sup>政治训令列举了行动的政治理由:4月17日日本内阁独占中国宣言及紧接着许多新的侵略步骤,表明日本侵华和中国民族危机到了新的阶段。国民党继续投降及出卖主权,引起群众的反帝反日情绪高涨,党必须利用其开展反日运动,进一步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从主力红军中派遣一部分为抗日先遣队,以便在全中国的民众前面证明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与红军是唯一的真正的民族解放斗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的提倡者与组织者,借此更进(一步)的揭露一切国民党的武断宣传,提高苏维埃与红军在全中国群众间的威信与推进群众的反日反帝运动到新的阶段”。福建是日本在华南的首要目标,闽浙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发展,有利于捍卫中央苏区。

高举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而行动,必须解释党的三个基本口号:即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保卫中国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推翻国民党卖国统治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只有苏维埃和红军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要“最广泛宣传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所提出的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三个条件及中共中央最近所提出的反日作战的五大纲领”,具体揭破国民党“抗日必先剿共”“中国无力抗日”的无耻胡说。利用抗日会、反帝同盟、民族自卫会等组织,吸引群众参加反日行动,依靠其中的左倾分子,驱逐把持领导的国民党走狗。组织群众的抗日义勇军或抗日自卫队、游击队,号召民众加入抗日先遣队。利用抗日的口号瓦解国民党军队,号召他们拒绝与红军作战,加入与联合红军抗日先遣队共同反日,并且将抗日的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相联系。<sup>③</sup>

之前接受“抗日”,只是不再将“抗日”视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而一概予以排斥,承认东北、华北的义勇军和淞沪抗战是真“抗日”,如今则因为“抗日”

是全民族的目光所聚,可以“抗日”之名行“反日”之实,也就是在“抗日”的旗帜下开展反帝反日反蒋的民族革命战争。

为了配合抗日先遣队出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于7月15日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文中“反日”与“抗日”基本混用,只是从历史渊源上略有分别,如“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反日义勇军的游击战争”“全中国唯一反日反帝的工农的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反日主张与反日行动”“反日团体”等,但是“反日”与“抗日”已经没有质的差异,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公开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以及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反日反帝运动的一切镇压与屠杀”。苏区和红军虽然面对国民党重兵“围剿”,却不能坐视中华民族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只要进攻苏区的军队接受三个条件,红军主力可在抗日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一切反日的民众都应该帮助我们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团结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周围,加入我们的抗日先遣队……一切抗日的民众,都是我们的同胞,一切抗日的武装,都是我们的同伴,我们都要联合起来。一切禁止与压迫我们抗日的个人团体与武装队伍都是汉奸卖国贼”。所提出的五大纲领,号召“组织民众的反日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没收日本及汉奸的财产,作为反日战费,普遍组织民众反日团体,实行“全中国民众的反日总动员,全中国民众的反日武装,全中国民众的反日团结”。<sup>④</sup>

鉴于反日统一战线密信发出后将近3个月,各地进展缓慢,7月25日,中共中央局发出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决定于八一纪念日正式宣布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成立,于九一八三周年纪念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抗日作战的领导机关”,把武装自卫从狭隘秘密状态变成公开的广大的群众运动,真正把反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深入到每个劳动群众中去,保证这一运动成为全国范围的伟大的反日反帝运动。要将现有的抗日部队转变成最可靠的

抗日武装力量,筹划抗日作战的经费,组织抗日的名流到海内外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在武装抗日领导机关代表选举中,要保证各地代表有具体意见与抗日作战的办法之提出。<sup>②</sup>文词之间,“反日”与“抗日”的分别进一步淡化。

次日,中央指示“各级党部必须把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动,在当地开展广大群众的反日反帝反国民党卖国,与拥护红军北上抗日的运动”。向广大群众“解释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的政治意义”,“解释苏维埃与红军一贯的澈[彻]底抗日的政策”,鼓动群众以红军已经北上抗日,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和“围剿”。“抗日”与“反日”逐渐脱离原有语境。如一方面要求趁机“组织抗日会等一切群众的抗日团体与抗日义勇军等一切群众的抗日武装,来推动与开展群众的抗日行动”,一方面又说“根据目前民族危机与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可以胜利去解释一切反日而政治信仰不同的中国人必须联合起来抗日”。至于“党必须迅速的到一切国民党与各反革命派所领导的有群众的抗日会,抗日义勇军,各学校,各黄色工会内,有群众的反日的和爱国的组织或锄奸团等,在群众组织中,加紧活动,发动群众的各种反日行动,如恢复与建立抗日义勇军,组织宣传募捐队与检查日货队等等”,不要说一般读者,即使专业人员恐怕也很难区分“抗日”和“反日”究竟有何分别以及为何要加以分别。当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使用不同的概念仍然是内外有别。如“我们应该大胆的与各种反动派别所领导的群众组织与一切狭隘的爱国主义的团体结成反日的民族的统一战线,以开展群众的反日运动”。再如要加强在白军士兵中的工作,“党要动员群众与一切反日的组织去宣传士兵”,组织苏区周围的白军士兵“不愿围攻北上抗日的红军与要求北上抗日的运动,广大的在士兵中一致对外,不打任何抗日部队的活动……领导白军士兵不听国民党命令,自动抗日,组织革命的兵变,配合红军北上抗日。……在招兵区域与许多特种兵的学校及下级军官的学校,我们必须参加进去进行民族的反日的煽动,争取觉悟分子,建立党的和反日的组织”。而在各省游击区域则应更加集中力量,“更加广泛的在抗日的旗帜之下,去武装民众,团结群众

在自己的周围”。<sup>③</sup>

不过,有时的内外之别,位置刚好互换。中革军委颁布的《红军抗日誓词》,又叫对日作战誓词,既称“我们是抗日反帝的先锋”,又说“我们的朋友是全世界工农,是全国反日群众,是满洲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sup>④</sup>中央局军委为开展士兵群众的反日运动,秘密致函华北各级党部,指责国民党政府“屠杀与镇压劳苦群众的反日运动,强令数万自动参加抗日战争的东北军士兵南下”打内战。在全国民众的武装自卫运动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下,“我们完全相信华北民众的抗日运动,必然有更大的发展。然而我们必须更尖锐提出的问题,就是开展华北士兵群众的反日运动的工作”。华北数十万白军士兵反日反帝的热忱极度沸腾,“无疑的要成为整个华北劳苦民众反日运动中的一个有力的武装支柱,进行华北士兵群众工作,争取与领导数十万白军士兵来参加华北民众的抗日战争,成为北方党目前第一等的伟大任务”。如果说上述大体能够分辨“反日”“抗日”的历史渊源,下面这段表述就有几分错位:“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不仅是证明了红军才是澈[彻]底抗日的铁军……使百万千万的士兵群众更加坚决的走上反日斗争的前线!因此,北方党在目前华北士兵群众积极反日的热情上,而以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动为中心,在士兵群众中进行广泛与顽强的宣传工作,坚决的组织与领导士兵群众的反日运动,具体的有计划的发动士兵群众反对国民党的卖国统治的哗变,响应红军北上抗日,开展华北民众的抗日游击运动。”这之前习惯的“反日”“抗日”用法似乎倒置。所提出的中心简明口号有“自动进行抗日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一致对外不打任何抗日部队”“反对南下进攻北上抗日的红军”“枪杀不抵抗的卖国长官,自动进行抗日战争”等,<sup>⑤</sup>“抗日”变成正面表述的主要概念。

长征开始,中共中央随红军转移,连续激战行军,又失去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无法掌握国内外局势的变化,更谈不上领导和指挥各地各级党部。此时上海(临时)中央局在共产国际尤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指导下,部分代行了中央职责,所制定的各项文件基本维持既有的口径。如

1934年12月15日《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提纲》，称我党领导的满洲人民革命军等“反日反满”力量继续壮大，影响了全满洲各处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寻找我党的领导，愿与人民革命军一致对日作战，不再“在东北军阀或虚伪的‘抗日英雄’的领导之下，而是逐渐地在我党与真正抗日的分子的领导之下进行着艰苦的反日战争”。<sup>⑧</sup>1935年6月10日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的意见，反复强调反日反蒋在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各方面的一致性。即使对方不愿接受红军反日反蒋作战协定的三个条件，只要愿意在反蒋的军事上与我们合作，亦应灵活抓住机会，“发展到更广泛的反日的斗争的领导”。<sup>⑨</sup>

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文中基本不再使用“反日”一词，提及相关的历史事实，除仍然存在的“反日会”组织名称、呼吁国际上支持理解中国民众的反日解放战争以及东北的武装反日战士、反日义勇军外，无论党内党外，全部改用“抗日”，如“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同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十九路军及民众的淞沪抗日血战”，“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刘崇武、田汉、杜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陈铭枢、方振武等抗日部队艰苦斗争”，“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为抗日而进行排货、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等救国运动”，“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而尚未获胜的原因之一，就是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之间存在隔阂误会，未能团结一致。为此，提议组成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的国防政府，“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行政方针第一点就是“抗日救国收复失地”。呼吁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包括国民党和蓝衣社中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的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组织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并高呼“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sup>⑩</sup>

《八一宣言》出自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之手，而10月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发出的秘密指示信，大概率也是如此或至少受到中共代表团的影响。函称全中国人面前唯一救国自救的出路，“只有抗日，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则做人，不抗日则做亡国奴”。蒋介石“取缔群众反日组织，逮捕反日群众，摧残抗日文化运动”，借口攘外必先安内，“进攻中国唯一的反日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摧残人民对日作战的根据地——苏维埃区域，以破坏与阻止全国人民与红军抗日作战”。红军到达对日宣战的目的地——陕甘青宁晋，“以图配合中国反日群众和反日游击队义勇军，共同实行对日直接的武装抗日神圣战争收复失地”。“受了中国红军及抗日义勇军抗日群众的联合战线的威胁”，蒋企图继续“围剿”陕北的红军，使中国人民逐渐懂得，“抗日必先讨蒋，只有讨蒋才能顺利的抗日。……抗日讨蒋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出路，是中国共产党目前工作中最主要的任务”。指示信虽有“反日”“抗日”两种表述，实际上已无严格分界，如指九一八以来各地群众的反日行动蓬勃发展，具体举出吉鸿昌、方振武等人的抗日反蒋，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与红军协定的抗日反蒋，杭州、汉口等地的抗日标语，少数国民党中委公开提出抗日，都在“抗日讨蒋的斗争洪流中”，同时又说“反日反蒋的革命洪流”或“反日反蒋的革命漩涡”。党要实现抗日讨蒋的任务，就要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讨蒋的力量”。“党要毫不犹豫的去与一切反日讨蒋的团体和个人进行联合”，“唤起全党的同志到一切反蒋抗日的集团力量中去”，“共同策谋抗日反蒋行动”。不管什么阶级、党派、组织，只要愿意反日反蒋，中共都愿意与之联合，“帮助他们发挥其一切反日反蒋行动的作用和方法”。要将反动团体中进行“反日反蒋”活动的觉悟的下层群众“引导到抗日反蒋的道路上来”。各地群众自发组织中的上下层都“对于抗日讨蒋的斗争精神很高涨”，一些国民党将军或反蒋集团也愿意参加反日工作。<sup>⑪</sup>

政出多门，使得中共在对日口径上存在大同小异的情形，一旦具体落实到“反日”与“抗日”的表述，小异有时就看似大别，外行人误以为决策者依然摇摆不定。11月13日，中共中央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称“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一切‘反蒋不能抗日’‘先反蒋后抗日’的思想,是反革命派别的欺骗宣传”。中共领导的红军主力“为了直接领导与组织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派出抗日先遣队后,全军“北上抗日”,“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到达西北,取得“抗日反蒋的胜利”。呼吁“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联合起来,“拥护与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的战争”。<sup>⑩</sup>半个月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又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将“抗日反蒋”与“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抗日的民族运动”并提。<sup>⑪</sup>

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要继续遵义会议的路线,健全组织系统,统一政令是当务之急。12月下旬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分别于23、25日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前者基本使用“抗日”,如“抗日联军”,“红军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队”,抗日根据地,抗日后方,抗日人民革命军,“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而提到吸引白军士兵和青年学生参加游击战争时,重点是使其“卷入反日浪潮”,并要加强蒙回两族的反日斗争。<sup>⑫</sup>后者主要沿用“反日”,提出“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反复使用“反日的民族革命”,并言及反日的基本力量、反日同盟者、反日战线、反日战争、反日反汉奸卖国贼斗争、反日运动等,而抗日的表述亦复不少,如抗日联军、抗日政府、抗日红军、抗日游击队、抗日根据地、抗日道路、抗日后方、抗日先锋队、抗日人民、抗日人民团体、抗日人民革命政权、抗日武装力量等。

政治决议中的如下内容或许有助于理解“反日”和“抗日”的分别及联系:“中国人民反日反卖国贼的方式,是多样的……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分子……都可以加入国防政府。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武装队伍,都可以加入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卖国贼力量的联合战线的政权组织,也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领导机关。在阶级意义上说来,他是在反日反卖国贼共

同目标之下的各阶级联盟。”“共产党的策略不是等待着那些自然发生的抗日人民团体与抗日武装力量已经存在了,才去把他们组织起来,而是指导自己的党员从各方面努力去推动一切爱国的分子,团体,阶层,阶级,党派……发起各种各样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团体(抗日会,抗日联合会等),组织各种各样反日反卖国贼的军队(抗日义勇军,人民革命军,新的十九路军等),政权(县市区抗日政府,人民革命政府等),把这些团体、军队、政权,集合起来,加上苏维埃与红军的力量,这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红军是抗日的先锋队,只有这个先锋队的扩大巩固与善于使用,才能保证反日战争的胜利。”<sup>⑬</sup>尽管这样的区分依稀可见历史留痕,却很难完全对应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初衷本意了。

### 七、完全改用“抗日”

在民族危机日益紧迫的形势下,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内外有别,很快就变成以对外的一面为主导。1936年1月25日红军致书东北军全体将士,表示愿意与之联合抗日。“抗日的东北军”与“抗日的红军”自然是一家,“抗日反蒋”才是唯一出路。通篇用“抗日”而不见“反日”。<sup>⑭</sup>3月1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军布告》,4月5日《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4月25日中共中央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5月5日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国民政府等机关、各党派团体和各报馆,6月12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全部都用“抗日”,没有出现“反日”字眼。<sup>⑮</sup>

而在内部文件中,“反日”的概念仍然沿用。如4月9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苏区革命互济会的组织与工作的决定》,就称苏区互济会的工作“应当适合反日人民战线与抗日战争的扩大,而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它应当积极援助白区白军的反日斗争”。<sup>⑯</sup>6月18日《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尽管基本使用“抗日”,也还有“英美帝国主义积极参加反日的开始”之说。<sup>⑰</sup>8月24日《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则“反日”与“抗日”混用,甚至以“反日”居多,如称“中国苏维埃与红军是中国人

民反日解放运动的中心力量,坚决号召一切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为了进行蒙古人民反日的民族解放斗争必须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反日统一战线应当利用每一个具体事实……来进行反日宣传与组织的工作。在目前最广泛的蒙人自救会应当成为反日反中国军阀的蒙古人民统一战线的机关与组织”,“进行武装反日反中国军阀的斗争”。<sup>⑧</sup>

不过,以“抗日”取代“反日”已成大势所趋,即使党内文件也开始改用“抗日”而不用“反日”。6月20日,中央提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所有表述全用抗日。<sup>⑨</sup>鉴于工作对象的特殊性,“抗日”既顾及了东北地区和东北军的主张,也有助于消除彼此隔阂,以示站在同一立场上。况且,通用“抗日”并不限于东北地区,包括华北在内,整个北方地区“抗日”更为流行。8月5日《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也是用“抗日”,如抗日战线、抗日统一战线、抗日主力、抗日群众等,仅有一处提及“六月反日出兵大示威以后,继着的长期罢课”,还是作为失败的教训。除顺应各地的民意輿情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对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各派和社会各界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共中央特别指出“要善于运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与民族统一战线的机能”,“在抗日统一战线方面要特别注意在各党各派影响下的群众及其领袖,并具体的分析各党派的特点,采取各种不同的策略以实际的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如针对历来与中共最尖锐对立的最右倾最反动的国家主义派中的进步分子,重新解释其两个口号,“外抗强权”不是指苏联而是指日本帝国主义,“内除国贼”不是指共产党而是指真正的汉奸卖国贼,果真如此,国家主义派不再是政敌,而是抗日战线中的同盟军。尤其是国民党虽然不是强有力的党,却是数量最多最普遍的党,党内派系林立,分歧严重,要争取他们从内部杀出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sup>⑩</sup>既然国民党各派也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争取对象,非要与之针锋相对的“反日”就失去了必要性,逐渐成为历史的记忆。

6月20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二中全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冯玉祥、李宗仁等国民党重要人物的抗日言论和抗日主张表示欢迎,愿意与国

民党西南诸领袖的抗日行动密切合作,支持一切抗日主张和行动,包括国民党各派,“拥护全国抗日领袖与抗日民众诚意的团结起来实现中国的统一”。“反日”一词仅仅用于指世界反日力量。<sup>⑪</sup>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书中国国民党,向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和全体党员再次大声疾呼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承认蒋介石关于“和平的绝望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的解释,较过去有了若干进步,并提出国共重新合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虽然不满于国民党蒋介石依然心存幻想,未能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但已不再斥责卖国,从而消除了反日反蒋联动的政治诉求。<sup>⑫</sup>9月1日的中央指示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蒋军全部或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因此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议国共合作,与反蒋的军阀联合抗日,但不袒护冲突的任何一方。<sup>⑬</sup>也就是说,为了一致抗日的大局,必须停止包括反蒋的一切内战。这就为“抗日”取代“反日”扫除了最后的障碍。

在“反日”转向“抗日”的关键环节上,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起到重要作用。“反日”与“反蒋”紧密联系,体现了共产国际的阶级路线,而“抗日”实际上是要转到立足于中国实际的民族路线,只有在争取和坚持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问题上,才实行阶级路线。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较早认定日本侵略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应该实行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民族统一战线,不再将反蒋作为斗争目标,与反日相提并论。由于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反帝人民战线”表述不尽一致,在中共中央提出申诉之时,代表团成员与实际负责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季米特洛夫认真协商,紧密配合,得到斯大林的批准,不仅改回民族统一战线,而且确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无疑进一步坚定了中共中央改“反日”为“抗日”的信心。

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认为“中国人民

的抗日救亡运动现在已竟[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判断南京国民党政府可能转向抗日。因此,“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应用尽一切方法与力量,最迅速的促进与(组织)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真正对日武装抗战”。不仅一律使用“抗日”,而且有时将过去的“反日”也改称“抗日”,如“去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决议上所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sup>⑤</sup>10月10日,中央通电庆祝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再度提出即将进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也就是创造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要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sup>⑥</sup>

从此,“反日”与“抗日”的角逐走进历史,“抗日”与“亲日”的斗争走到台前。尽管国民党仍在继续进攻苏区,共产党却决心尽一切努力使之加入抗日的行列,即使西安事变后准备应对讨伐军的防御战,也“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sup>⑦</sup>在重新控制的原苏区或游击区以及友军撤退区,苏维埃政权一律改为抗日救国政府,群众武装均改称抗日义勇军(脱产的)和抗日自卫军(不脱产的)。<sup>⑧</sup>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共中央认为,从1935年12月9日开始的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心是停止内战,从1937年4月起至抗战开始的新时期的第二阶段,是巩固和平准备抗战,中心是实现抗日的民主权利。新阶段必须坚持联蒋抗日的方针,应该向反蒋的地方军阀解释,“只有同蒋介石南京政府共同合作抗日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反对地方军阀用民主的口号反蒋造成分裂。<sup>⑨</sup>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向全党同志宣告:“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即是要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本党早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与十二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这一新政策的提出,是由于本党首先把中日两国间的矛盾,列入了中国革命议事日程的第一位,而把其他中国内部的矛

盾放在从属的地位,‘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就是本党当时动员群众的口号,也就是本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最初目标。”<sup>⑩</sup>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全体中国人将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为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浴血奋战。

从“反日”到“抗日”,一字之异,却蕴藏着诸多时代信息,反映出历史的曲折复杂及变化万千。其中的关键之一,就是中国革命从国际的阶级路线转向立足本国的民族路线。前者一方面是着眼于世界革命的全局,将中国视为局部,一方面是服从共产国际的整体战略,并在其中充当配角。后者则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因应主要矛盾的变化适时调整主要斗争对象以及相关的战略策略,以局部的丰富性增强全局的多样性,使革命道路更加坚韧不拔。目前所看到的相关文献汇集选编,有的正副标题均为原件所有,有的副标题是在报刊发表时由编辑附加,有些则副标题甚至正标题都是后来的编辑者按照有助于阅读理解的心中之是所拟。由于后一种情况未能严格区分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难免混淆,而且三种情形参杂,编辑者又没有清晰标注,混作一团,必须仔细比较材料与史事,才能把握历史演进的脉络及其背后的原因。如果不能清楚分辨,以为大同之下,无所谓小异,则历史事实千篇一律,不见差异,只能求同,文本解读自然无法求得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万千变化。历史画卷失去生动变得刻板,历史人物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就会显得轻而易举,弱化了应有的感召力和冲击力。

#### 注释:

①《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1933年1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1933),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4页。

②《中国共产党、共产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和进攻华北告全国民众书》(1933年1月7日),《红旗周报》临时附刊,1933年1月28日,第5-10页。

③《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1933年1月17日),《红色中华》第48期,1933年1月28日第1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1933)收录此文时增加副标题“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

④《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1933年4月15日),上海《斗争》第40期,1933年4月21日,第6-7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1933)收录此文时增加副标题“重申愿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共同抗日的主张”。

⑤《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1933年1月26日),上海《斗争》第44期,1933年6月10日,第12-15页。

⑥《中共中央委员会、江苏省委员会给上海工厂支部的一封信》(1933年1月2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1933),第54-56页。

⑦《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关于召集全国民众团体的救国会议》(1933年2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1933),第71-75页。

⑧《反对叛徒斗争的提纲》,上海《斗争》第36期,1933年3月13日,第17-18页。

⑨《中央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1933年3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1933),第162-163、165、168、171页。

⑩《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1933年5月25日),上海《斗争》第43期,1933年5月31日,第6-7页。

⑪《紧急通知——关于中日秘密谈判与国民党出卖平津及华北的问题》(1933年5月25日),上海《斗争》第43期,1933年5月31日,第1页。

⑫《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1933年6月23日),上海《斗争》第47期,1933年7月9日,第2页。

⑬《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告全国民众书》(1933年8月5日),《红旗周报》第60期,1933年9月30日,第4页。

⑭《中央关于“九一八”二周年纪念的决定》(1933年8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1933),第287页。

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论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1933年6月8日),上海《斗争》第44期,1933年6月10日,第4-6页。

⑯《上海中央局转发共产国际、少共国际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指示》(1933年6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1933),第238页。

⑰《中央通知(不列号)——关于欢迎国际反帝非战大同盟代表团来华及反帝大会的筹备》(1933年6月18日),上海《斗争》第45、46期合刊,1933年6月20日,第20页。

⑱《紧急通知》(1933年8月21日),上海《斗争》第52期,1933年8月30日,第2页。

⑲《关于“一二八”两周年运动的决议》(1934年1月8日),上海《斗争》第61期,1934年1月12日,第10-11页。

⑳《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国共产党五中全会1934年1月18日通过),苏区中央局《斗争》第47期,1934年2月16日,第14页。

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1934年2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第661-662页。

㉒《中央给满州省委指示信》(1934年2月22日)、《中央给河南工委指示信》(1934年3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第121-137、155-157页。

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新进攻告民众书》(1934年4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第196-201页。

㉔《中央紧急通知——关于在目前华北紧急形势下各级党的任务》(1934年4月1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第220-221页。

㉕《中央致各省委、县委、市委的一封秘密指示信——关于开展反日反帝运动和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1934年4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第251-252、255-259页。

㉖《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1934年4月20日),《红色中华》第236期,1934年9月21日第1-2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第681-686页。

㉗《党、团中央为声讨国民党南京政府告全国劳动群众书》(1934年5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第279页。

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1934年6月19日),《红色中华》第206期,1934年6月23日第1版。

㉙《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关于派遣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1934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第332-334页。

㉚《中央书记处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1934年7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第336-341页。

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第346-350页。

㉜《中共中央局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1934年7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第367-368、371-372页。

㉝《中央秘密通知(不列号)——关于红军北上抗日行动对各级党部的工作指示》(1934年7月2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第375-378页。

③④《红军抗日誓词》(1934年8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第330页。

③⑤《中央局军委为开展士兵群众反日运动给华北各级党部的一封秘密信》(1934年8月1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第381-382页。

③⑥《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提纲》(1934年12月15日),上海《斗争》第77期,1935年1月18日,第2页。

③⑦《中共临时中央局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1935年6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第513页。

③⑧《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第519、521-523、525页。

③⑨《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1935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第561-567页。

④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935年11月1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第574-575页。

④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935年11月2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第580-582页。

④③《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23日政治局通过),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第589-592页。

④④《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1935年12月25日通过),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第601-613页。

④⑤《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1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第4-8页。

④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布告》(1936年3月1日),《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1936年4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1936年4月25日),《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1936年6月1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第9-13、17-26页。

④⑦《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苏区革命互济会的组织与工作

的决定》(1936年4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第16页。

④⑧《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1936年6月1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第28页。

④⑨《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1936年8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第71-75页。

④⑩《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1936年6月20日于瓦窑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第30-42页。

④⑪《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1936年8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第62-67、61-63页。

④⑫《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6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第43-47页。

④⑬《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年8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第77-86页。

④⑭《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936年9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第89-91页。

④⑮《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936年9月1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第93-94、96页。

④⑯《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1936年10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第101-102页。

④⑰《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第128页。

④⑱《中央关于不同地区的地方工作指示》(1936年12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第132-133页。

④⑲《中央关于坚持联蒋方针推动全国对日作战问题给刘少奇的指示》(1937年4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第176-177页。

④⑳《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日而斗争》(1937年4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第193-194页。